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62期(民國97年12月)，141-16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明末至澳門募葡兵的姜雲龍小考：兼答熊熊先生對「e-考據」的批評*

黃一農**

摘　要

崇禎三年(1630)，著名天主教士大夫徐光啓(1562-1633)奏遣姜雲龍(c.1575-?)赴澳門募兵購砲，不料姜氏被控貪瀆冒餉，遭革職議罪，三百多名熟稔火器的援軍，亦在南昌遭遣返，終結了薩爾滸戰敗(1619)以來陸續引進西方砲學的努力。本文嘗試追索姜雲龍其人其事，希望能理解徐光啓為何會將此一重要任務交付姜氏，並探究西學在明末社會的穿透力與擴散力，同時兼論史學在「e-考據時代」所面臨的挑戰。

關鍵詞：明史、軍事史、姜雲龍、徐光啟、e-考據

---

* 此研究乃國科會計畫「明清中國的軍事革命與火藥帝國」(NSC 95-2411-H-007-009)之成果。文中所引筆者先前已出版之論文，均可自本人網站(http://ylh.theweb.org.tw/)全文下載。
收稿日期：2008年9月10日，通過刊登日期：2008年11月6日。

** 中央研究院院士、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特聘講座教授

一、前　言

筆者在拙作《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中揭舉史學已進入「e-考據時代」，指出隨著出版業的蓬勃以及圖書館的現代化，再加上網際網路和數位資料庫的普及，新一代的歷史工作者常擁有博聞強識的前輩學者們夢寐以求的環境，有機會在很短時間內就掌握前人未曾寓目的材料，亦即，歷史研究將在方法論上面臨極大衝擊。但爲避免偏頗，筆者也強調：e-考據必須建立在深厚的史學基礎之上，而清晰的問題意識與靈活的搜尋技巧，更將是考據功力高下之所繫。[1]

拙著中的說法在學界引發許多迴響與關注，如華中師範大學前校長章開沅教授稱：「（《兩頭蛇》）所包含的方法論對我們有很大的啓發。我們可以對考據學和解釋學展開討論，使它們進入一個更高的層次，從而使史學走上更好、更健康的道路。」[2]此外，黃時鑒（杭州浙江大學）、夏伯嘉（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古偉瀛（台北台灣大學）、張國剛（北京清華大學）、祝平一（台北中央研究院）、李天綱（上海復旦大學）、白謙慎（美國波士頓大學）等教授亦在書評或著述中表示認同。[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9 期登載一篇由《北京青年報》熊熊

1　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 年初版），頁 x、43-44、63-64。

2　摘錄自章先生 2006 年 4 月 26 日在四川大學所做「中國史學的發展趨勢」之講稿，參見 http://www.blogcn.com/u/91/24/zhujingjin/blog/36833901.html。

3　黃時鑒，〈歷史天空的「兩頭蛇」〉，《九州學林》，卷 4 期 3(2006)，頁 302-309；夏伯嘉，〈書評：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九州學林》，卷 4 期 2(2006)，頁 336-347；古偉瀛，〈書評：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臺大歷史學報》，期 37（2006 年 6 月），頁 351-356；張國剛，〈「兩頭蛇」的行藏〉，《博覽群書》，2006 年第 7 期，頁 31-35；祝平一，〈讀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新史學》，卷 17 期 2（2006 年 6 月），頁 251-255；李天綱，〈e 時代的考據之魅〉，《書城》，2007 年第 4 期，頁 45-49；白謙慎，〈網絡時代明清書法史研究的史料問題〉，「2008 中國蘇州（相城）書法史講壇」，蘇州：中國書法家協會，2008 年 7 月 18-21 日。《兩頭蛇》一書現已在海峽兩岸刊印繁簡體字各兩版，至於國內外的二十幾篇書評，可參見 http://ylh.theweb.org.tw/book/book02_5.htm。

先生所發表的文章，對《兩頭蛇》一書的深度和廣度提出一些正面評價，但也舉證批評稱：「e-考據在展示了自己的便利性時，也讓人們看到了它的脆弱性」、「e-考據不能只運用這些（電子）資料，而放棄對非 e 資料的運用」、「《兩頭蛇》中史料的豐富程度大大超過了許多前人的著作，但作爲求證手段之一的 e-考據，其功用不能被過分高估，非電子化史料和田野考察是歷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求證手段，歷史研究中的『小心的求證』，永遠不可能被 e 時代的高速所取代」。[4]由於筆者先前不曾有機會釐清類似之誤解，在感謝熊先生的費心匡正之餘，擬用 e-考據之法試做一小小的個案研究，希望藉以代答，並激發更多的思考與討論。

本人現正撰寫一本有關明清軍事史的專書，習知在徐光啓(1562-1633)等奉教人士的積極推動下，明末曾數次自澳門引進西洋火砲和銃師。最後一次努力發生在崇禎三年(1630)，徐光啓所奏遣的中書姜雲龍(c.1575-?)被控貪瀆冒餉，遭革職議罪，三百多名熟稔火器的傭傭軍，亦在南昌遭遣返，此事終結了薩爾滸戰敗以來(1619)明廷陸續引進西方砲學的努力。[5]

然而，長期以來學界對姜雲龍生平事跡的認識一直無法突破，主要內容幾乎全出自《崇禎長編》對其赴澳門一事的敘述，既不清楚他的出身背景和社交網絡，亦不知徐光啓何以會將此一重要任務交付此人。[6]姜雲龍在中西交流史上就像一顆稍瞬即逝的流星，似乎未留下太多痕跡。但隨著近年四庫系列古籍的重印以及中文典籍的大量數位化，我們開始有機會在較短時間內掌握前人未曾寓目的材料，並透過邏輯推理的佈局，填補探究歷史細節時的隙縫。下文即在「明人文集聯合目錄及篇目索引資料庫」（台北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

4 熊熊，〈e 時代的兩頭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59（2008 年 3 月），頁 157-162。

5 董少新、黃一農，〈崇禎年間援華葡兵新考〉，審稿中。

6 先前主要的討論，參見方豪，〈明清間西洋機械工程學物理與火器入華考略〉，收入《方豪六十自定稿》（台北：自印本，1969），頁 289-318；張小青，〈明清之際西洋火炮的輸入及其影響〉，收入《清史研究集第四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頁 48-106；萬明，《中葡早期關係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 209-213；湯開建，《委黎多《報效始末疏》箋正》（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頁 187-195。

下文簡稱「明人文集資料庫」）、「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等檢索工具的協助下，嘗試追索姜雲龍其人其事，並展現 e-考據時代所可能達到的深入研究成果。

二、天啟年間出仕的姜雲龍

姜雲龍，字神超，松江華亭人，萬曆二十五年(1597)在應天鄉試中舉。[7]他的松江同鄉徐光啓，雖亦於同一年中舉，但卻是應試於北京順天府。姜、徐二人應頗有往來，他們不僅有共同的朋友，[8]且曾於萬曆三十一年(1603)相偕至京參加會試。[9]萬曆四十七年(1619)春，落第的姜雲龍在與友人餞別時，忽聞明軍

7 有些文獻稱姜氏為上海人，然因其世居在華亭縣普照寺旁，應稱是華亭人較恰當。參見〔清〕俞樾纂，應寶時修，《上海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蘇省》，號 169（台北：成文出版社據同治十一年(1872)刊本影印，1975），卷 15，頁 25；〔清〕馮鼎高等修，王顯曾等纂，《華亭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蘇省》，號 462（台北：成文出版社據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儀松堂刊本影印，1983），卷 14，頁 2-3；〔清〕宋如林等修，孫星衍等纂，《松江府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蘇省》，號 462（台北：成文出版社據嘉慶二十二年(1817)松江府學明倫堂藏版刊本影印，1970），卷 77，頁 10。感謝復旦大學的賈雪飛同學提供此一意見。

8 如董其昌嘗替徐光啓在上海徐家匯的別業書匾，而姜雲龍亦與董其昌相熟。又，姜氏曾與張鼐同社，而張鼐則稱徐光啓是自己的「同舍」。參見〔清〕宋如林等修，孫星衍等纂，嘉慶《松江府志》，卷 78，頁 19、卷 82，頁 32；〔清〕宋徵輿，《林屋文稿・詩稿》，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冊 215（台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據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九籥樓刻本，詩稿配鈔本影印，1997），文稿，卷 15，頁 20；〔明〕張鼐，《寶日堂初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76-77（北京：北京出版社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二年(1629)刻本影印，2000），卷 11，頁 71-72。本文所引用之詩文別集和原始文獻，多是以「（姜）神超」或「（姜）雲龍」等字為關鍵詞，查索自「明人文集聯合目錄及篇目索引資料庫」（台北：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http://ccs.ncl.edu.tw/topic_02.html）和「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http://www.er07.com/），不再一一說明。

9 參見〔明〕錢希言，〈春申浦上送黃長卿、金飛卿、徐子先、姜神超諸孝廉計偕北上……〉，收入氏著，《松樞十九山》（東京：高橋情報據日本內閣文庫藏明萬曆二十八年(1600)序刊本影印，1991），討桂編，卷 9，頁 16。由於該卷所收之詩乃按照時間順序排列，故從前後詩之繫年，可判斷此詩應不出壬寅和癸卯兩年，亦即諸人應是北上參加萬曆三十二年(1604)甲辰歲之會試。子先為徐光啓的字。

在薩爾滸之役大敗，於是「慨然有處仲擊唾壺意」，[10]顯露出其渴望報國的激烈情懷。

天啓二年(1622)九月初二日，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孫承宗(1563-1638)抵關視事，並奉旨以原官督理山海關及薊遼、天津、登萊各處軍務。[11]十二月，他疏奏自己的人事布局曰：「主事鹿善繼、王則古，臣以之管兵馬錢糧；主事沈棨、杜應芳、司務孫元化(1581-1632)，臣以之管軍器、火藥；贊畫中書宋獻及羽林衛經歷程崙，臣以之管撫夷、買馬錢糧；而兩道臣袁崇煥(1584-1630)、萬有孚，奔走風霜，馳驅險隘。」[12]其中頗見承宗同年好友徐光啓的影子：如孫元化是萬曆四十年(1612)舉人，曾向徐氏習學火器和算法；至於鹿善繼(1575-?)，登萬曆四十一年(1613)進士，徐光啓爲其房師，鹿氏嘗自稱所受的師恩在「風塵格套」之外；沈棨爲鹿善繼的會試同年，曾被徐光啓推舉爲仿製西洋大砲的人選。[13]

姜雲龍應在此時至遼東參贊孫承宗戎幕，但非其最核心之僚屬，[14]亦無正式官銜，此故，在高出的〈贈姜神超孝廉應幕府辟〉一詩，[15]以及程崙的〈渝關，九日，高陽孫相國招同鹿乾嶽、沈彥威、杜培亭（農按：即鹿善繼、沈棨、杜應芳）三職方、姜神超孝廉飲〉詩中，[16]均僅以孝廉稱呼姜氏。

---

10 東晉大將王敦，字處仲，每酒後往往歌詠魏武帝的樂府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並以如意敲打唾壺以和節拍，以抒發壯懷。參見〔唐〕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點校本），卷 98，頁 2553-2557。本文中所引用的官修史料多查索自「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http://140.109.138.249/ihp/hanji.htm），不再贅述。

11 〔明〕溫體仁等撰，《明熹宗實錄》，收入黃彰健校勘，《明實錄》，冊 14（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據該所民國五十一年刊本縮編，1984），卷 25，頁 16、卷 26，頁 15。

12 《明熹宗實錄》，卷 21，頁 8、卷 32，頁 10。

13 黃一農，〈天主教徒孫元化與明末傳華的西洋火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67 本第 4 分（1996 年 9 月），頁 911-966。

14 如宋獻雖亦爲舉人，但獲授試中書舍人，「聽樞輔孫承宗隨便任用」。參見〔明〕劉榮嗣，《簡齋先生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46〔北京：北京出版社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元年(1661)劉佑刻本影印，2000〕，文選，卷 3，頁 22；〔明〕溫體仁等撰，《明熹宗實錄》，卷 21，頁 21。

15 〔明〕高出，《鏡山庵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30-31（北京：北京出版社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刻本影印，2000），卷 22，頁 4。

16 〔明〕程崙，《寸補》（東京：高橋情報據內閣文庫藏崇禎四年(1631)序刊本影印，1991），

天啓三年(1623)正月，順天巡撫岳和聲推薦姜雲龍爲內閣中書，奉旨：「姜雲龍、茅元儀既屢經疏薦，准擬職銜用。」[17]明代絕大多數官員的選任均由吏部掌握，但內閣中書舍人則屬例外，此職被視爲內閣的屬官或秘書，故由內閣直接選用、考察，甚至介入其升遷。[18]由於天啓三年時的首輔是葉向高，出鎮山海關的大學士孫承宗更是葉氏的門生，[19]知姜雲龍被授爲佐承宗幕的內閣中書（農按：應爲試職，詳見後文），頗有跡可循。

孫承宗是明末抵抗後金的重要人物，亦是東林黨的首腦之一，他在遼東共恢復疆土四百里，安插遼人四十萬，穩定了屢戰屢敗的軍心和民心。天啓四年(1624)六月，左副都御史楊漣(1752-1625)劾魏忠賢(1528-1627)二十四罪，遭切責，黨爭開始白熱化。七月，首輔葉向高(1559-1627)被指爲東林黨魁，罷歸。十一月，孫承宗以賀聖壽爲名，欲入覲面論魏忠賢之罪，但被魏氏求旨阻於通州。五年(1625)三月，魏忠賢興大獄，楊漣等二十餘大臣均被下獄或削籍。稱病在籍家居三年多的徐光啓，雖不參與黨爭，也以「招練無功」於五月遭罷，並被革去禮部右侍郎銜。十月，魏忠賢亦抨擊承宗「雖嫻于兵，而方略疏焉」，將其去職。[20]

渝吟，卷 1，頁 1。由於此詩有「令節渝關兵舉觴」、「借將萸酒祝陶唐」等句，知此詩應繫於天啓二年九月初九日的重陽節。

17 當時受岳氏薦舉者近二百人，其中進士和舉人共八、九人，但只有姜、茅二人被起用，且雲龍是「和聲二百人中所首荐邊材者」。參見〔明〕茅元儀，《石民四十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冊 1386-138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刊本影印，1995），卷 1，頁 2、卷 78，頁 8；〔明〕岳和聲，《餐微子集》，收入《明季史料集珍》，第 2 輯（台北：偉文圖書公司據中央圖書館藏明天啓刊本影印，1977），薊門疏草，卷 1，頁 24-39。〔明〕李長春，《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實錄》，收入《明實錄・附錄》，輯 18（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據該所藏抱經樓舊鈔本影印，1984），頁 376。

18 明置中書科中書舍人，文華殿、武英殿中書舍人，以及內閣誥勑房、制勑房中書舍人三類，均爲從七品。參見顏廣文，〈明代中書舍人制度考略〉，《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 年第 6 期，頁 107-113。查索自北京中國學術期刊（光碟版）電子雜誌社之「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http://acad.cnki.net/Kns55/Navigator.aspx?ID=CJFQ)。

19 〔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點校本），卷 110，頁 3379；〔明〕孫承宗，《高陽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164（北京：北京出版社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初刻嘉慶補修本影印，2000），文卷，卷 20，頁 48-49。

20 黃一農，〈天主教徒孫元化與明末傳華的西洋火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67 本第 4 分，頁 916、922。

天啓五年十二月，在魏忠賢的積極推動之下，帝命於來春開館纂修《三朝要典》，由輔臣顧秉謙、丁紹軾、黃立極、馮銓擔任總裁官，鄭崇光、姜雲龍爲收掌官。[21]六年(1626)六月十三日，諭旨有云：「姜雲龍見掌制勅，管關主事着別推一員去。」[22]十九日，閹黨將藉以攻訐東林黨人的《三朝要典》送呈御覽，姜雲龍在此書上所繫的官銜是「試中書舍人・加五品服俸」。[23]知天啓五、六年之交姜氏回京，在內閣的制勅房仍任試職，[24]然其參與《三朝要典》的修撰工作時，曾獲特殊待遇。稍後，雖有人推舉他外放至山海關擔任管關主事（正六品），惟並未獲得允准。

姜雲龍回京後所從事的工作，應與其出色的文筆相關，畢自嚴即曾在信函中稱譽他「所撰贈章神采陸離，足令九原不朽」。[25]但姜雲龍或因被歸爲孫承宗的朋黨，旋在六年八月遭「削籍爲民，仍追奪誥命」，有旨責以「居間鑽刺，躍冶不祥也」，[26]其中「躍冶」一辭乃指其自以爲能，急於求用。

同一時期，孫承宗在遼東的主要僚屬多遭閹黨矯旨斥逐：如贊畫茅元儀(1594-1640)於天啓六年六月亦被控「鑽刺」，削職爲民；[27]先前曾參與起草九

21 收掌官乃負責所有編修成果的收藏管理。參見〔明〕徐肇台，《甲乙記政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雜史類》，冊 43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1997），頁 145-146。

22 〔明〕徐肇台，《續丙記政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雜史類》，冊 43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1997），頁 53。

23 楊艷秋，〈《明光宗實錄》、《三朝要典》的編修〉，《史學史研究》，1998 年第 4 期，頁 48-52；〔明〕顧秉謙等，《三朝要典》，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冊 56（北京：北京出版社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六年(1626)禮部刻本影印，2000），卷首。

24 制勅房之中書舍人，掌書辦制勅、詔書、誥命、冊表等事，無定員，例於舉人內考取，授以試中書舍人，通常需要三年以上年資和一定表現後，始能實授中書舍人。參見不著撰人，《明神宗實錄》，收入《明實錄》，冊 11-13（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據該所民國五十一年刊本縮編，1984），卷 252，頁 3；顏廣文，〈明代中書舍人制度考略〉，《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 年第 6 期，頁 107-113。

25 〔明〕畢自嚴，《石隱園藏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9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崇禎間成書，1983），卷 8，頁 52。查索自「中國基本古籍庫」。

26 談遷則記姜雲龍在天啓六年九月四日被「削奪官誥」。參見不著撰人，《倒戈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雜史類》，冊 55（台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據北京圖書館藏清初鈔本影印，1996），頁 123；〔明〕談遷著，張宗祥標點，《國榷》（北京：古籍出版社，1958，初刊於順治十年(1653)），卷 87，頁 5336；〔明〕溫體仁等撰，《明熹宗實錄》，卷 75，頁 3。

27 〔明〕溫體仁等撰，《明熹宗實錄》，卷 72，頁 3。

卿参劾魏忠賢之奏疏的兵部主事孫元化，則於七年二月被控「營謀贊畫」，而施以「冠帶閑住」的處分；[28]七年(1627)七月，先後在寧遠和錦州大挫後金的遼東巡撫袁崇煥，亦被批評「暮氣難鼓，物議滋至」，被迫引疾求去；[29]兵部郎中鹿善繼更已於六年中以病劇為由辭官。[30]

三、姜雲龍在崇禎朝的起落

崇禎帝即位初期，力挽狂瀾，黜斥魏忠賢閹黨，孫承宗及其先前經略遼東時的部屬，遂次第獲重用：天啓七年八月，起陞鹿善繼為尚寶寺卿；[31]十一月，起袁崇煥為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崇禎元年(1628)三月，茅元儀復副總兵職銜，贊畫軍務；[32]四月，袁崇煥陞授兵部尚書，督師薊遼；二年(1629)十一月，後金軍入關，京師戒嚴，孫承宗以知兵被起為兵部尚書兼中極殿大學士。[33]

姜雲龍應是在此波變動中復原官，因畢自嚴在崇禎三年正月的奏疏中即稱姜氏的職銜為「淮揚、蘇松、常鎮、徐州制敕房・試中書舍人」。[34]《上海縣志》中記姜雲龍嘗加三品服出使琉球。[35]查晚明僅崇禎二年六月曾冊封琉球，正副使為戶科給事中（從七品）杜三策和行人司司副（從七品）楊掄。[36]知姜雲龍應參預此事，而他當時或已回任試中書舍人。二年十二月，崇禎帝將率兵

28 〔明〕溫體仁等撰，《明熹宗實錄》，卷 81，頁 13。
29 〔明〕溫體仁等撰，《明熹宗實錄》，卷 86，頁 4。
30 〔清〕陳鋐編，《鹿忠節公年譜》，收入《百部叢書集成》，冊 94，《畿輔叢書》第 17 函（台北：藝文印書館據清王灝輯光緒定州王氏謙德堂刊本影印，1966），卷上，頁 29-30。
31 〔清〕陳鋐編，《鹿忠節公年譜》，卷上，頁 31。
32 〔清〕汪楫編，《崇禎長編》（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室藏），卷 7，頁 19。
33 此段參見黃一農，〈天主教徒孫元化與明末傳華的西洋火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67 本第 4 分，頁 911-966。
34 〔明〕畢自嚴，《度支奏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48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1997），堂稿，卷 11，頁 38。
35 〔清〕俞樾纂，應寶時修，同治《上海縣志》，卷 15，頁 25。
36 〔清〕汪楫編，《崇禎長編》，卷 21，頁 1-2、卷 23，頁 1；〔清〕張廷玉等，《明史》，卷 323，頁 8369-8370。晚明出使琉球的情形乃查索自「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

入衛京師的袁崇煥下獄，時人多認爲袁氏「引敵脅和」，罪不可赦，雲龍亦曾以中書舍人的身分（或已實授）上疏，指斥其昔日同僚袁崇煥。[37]

崇禎三年四月，奉旨訓練京營兵士的徐光啓，奏遣姜雲龍同葡籍耶穌會士陸若漢(João Rodrigues, 1561?-1633)等前往澳門，「置辦火器及取善砲西洋人赴京應用」。[38]由於西文文獻中直書姜雲龍之名，但對其他入教的中國人則稱呼其洗名，知姜雲龍應不是教徒。[39]然姜雲龍應對西學、西教抱持友善態度，否則徐光啓不至於推薦其出任此要事。而時爲中極殿大學士的孫承宗，應亦會協助徐氏調派在內閣任職的姜雲龍。

我們從姜雲龍的師友、同儕和戚屬，亦有機會間接瞭解他對西學和西教的態度。姜氏所生長的松江地區，明末因受徐光啓等天主教士大夫的支持，耶穌會士往來頻繁，地方官員對西人、西教也十分友善。如崇禎年間長期擔任松江知府的方岳貢(?-1644)，曾起用「得西人火器秘傳」的陳于階（徐光啓的奉教外甥）協助築城，[40]亦曾替徐光啓的《農政全書》作序；傳說方氏還曾在返鄉省親時，將傳教士順道帶往湖北穀城開教。[41]姜雲龍的同鄉友人董其昌(1555-1636)，與徐光啓相熟，兩人曾結伴赴鄉試，董氏且是光啓奉教門人韓雲和韓霖兄弟的忘年交。[42]雲龍的女婿宋徵輿(1618-1667)與李雯(1608-1647)和陳

37 顏廣文，〈袁崇煥死因試析〉，《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4 年第 4 期，頁 81-84；〔清〕汪楫編，《崇禎長編》，卷 29，頁 12-14。顏文查索自「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38 〔明〕談遷著，張宗祥標點，《國榷》，卷 90，頁 5503-5504；〔清〕汪楫編，《崇禎長編》，卷 33，頁 28。

39 參見 *Jesuítas na Asia* (Lisboa: Biblioteca da Ajuda, Cód. 49-V-9)，fl. 74. 筆者感謝復旦大學的董少新博士協助翻譯本文所使用的葡文材料。又，姜雲龍里居時亦曾與和尚往還密切，如見〔明〕郭濬，《虹暎堂詩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未收書輯刊》，輯 6，冊 27（北京：北京出版社據清順治刻本影印，1997），卷 8，頁 12。

40 陳于階於崇禎十七年因史可法之薦，在福王政權陞授兵部司務，負責「督鍊火器」，後在清軍攻破南京時殉國。參見〔清〕俞樾纂，應寶時修，同治《上海縣志》，卷 19，頁 41；〔清〕宋如林等修，孫星衍等纂，嘉慶《松江府志》，卷 55，頁 54-55；陳垣，〈明末殉國者陳于階傳〉，《輔仁學誌》，卷 10 期 1-2(1941)，頁 45-49。

41 康志傑，《上主的葡萄園：鄂西北磨盤山天主教社區研究(1636-2005)》（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6），頁 12-13。

42 梁家勉，《徐光啓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 51；黃一農，《兩頭蛇》，頁 229-238。

子龍爲摯友，併稱雲間三子；[43]其中李雯嘗贈詩奉教的韓雲和魏學濂(1608-1644)，也曾推薦韓霖其人其文。[44]而陳子龍除曾向徐光啓問學外，後並與陳于階等人共同編印《農政全書》；當子龍殉明之後，照顧其遺孤的責任即是由孫元化之子和斗擔起。[45]

又，在姜雲龍的同僚當中，除奉天主教的孫元化外，有不少人因西砲而接觸過西人、西學。如茅元儀幼時隨父在京宦遊時，曾與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相識；天啓三年，且親自向在京營教砲的葡人學習，後運砲出關，並於五年遭罷歸時，將操砲之法傳授滿桂。[46]沈棨應亦接觸過西學，此因徐光啓曾於天啓元年四月疏請由沈棨協同奉教之李之藻(1565-1630)大量製造西洋大砲。[47]天啓六年正月，袁崇煥在寧遠力挫後金大軍時，城頭所佈置的十多門西洋大砲即扮演重要角色。[48]再者，程崙亦曾於萬曆三十七年(1609)在北京面晤利瑪竇談論醫學。[49]

至於姜雲龍所中萬曆二十五年應天鄉試的相關人員當中，除主考官朱國祚

43 崇禎十年(1637)，李雯還曾在徵輿家中教館。參見姚蓉，《明末雲間三子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頁 33-39；〔清〕宋徵輿，《林屋文稿・詩稿》，文稿，卷 10，頁 2、卷 15，頁 20。

44 〔清〕李雯，《蓼齋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111（北京：北京出版社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順治十四年(1657)石維崑刻本影印，2000），卷 26，頁 7、卷 26，頁 11、卷 34，頁 1-2、卷 37，頁 18-20；黃一農，《兩頭蛇》，頁 214-221、229-243。

45 〔明〕徐光啓纂輯，陳子龍編，《農政全書》，收入〔清〕紀昀等總纂，《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731（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崇禎十二年(1639)初刊，1983）；〔清〕聞在上修，許自俊等纂，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上海府縣志輯》，冊 7《嘉定縣續志》（上海：上海書店據康熙二十三年(1684)刊本影印，1991），卷 3，頁 30；李天綱，〈早期天主教與明清多元社會文化〉，《史林》，1999 年第 4 期，頁 43-60。

46 〔明〕茅元儀，《石民四十集》，卷 69，頁 1；〔明〕茅元儀，《督師紀略》，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冊 36（北京：北京出版社據北京圖書館藏明末刻本影印，2000），卷 12，頁 13-14。

47 〔明〕徐光啓撰，王重民輯校，《徐光啓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頁 175。

48 此見〔清〕彭孫貽撰，刁書仁等標點，《山中聞見錄》（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先清史料》標點本，1990），頁 41；〔清〕海濱野史，《建州私志》（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清入關前史料選輯（一）》標點本，1985），頁 278；〔明〕溫體仁等撰，《明熹宗實錄》，卷 68，頁 30。

49 但程崙批評利瑪竇曰：「議論不出岐伯範圍之內，非達理者，何足以語醫！又何足以稱道哉！」參見〔明〕程崙，《寸補》，醫案，卷上，頁 2。查索自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之「全文影像資料庫」(http://lib.ihp.sinica.edu.tw/c/database/db.htm#graph)。

(1559-1664)曾批判天主教之外，[50]倒不乏友教之人。如另一位主考葉向高(1559-1627)嘗爲耶穌會士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的《職方外紀》和奉教士大夫楊廷筠(1557-1626)的《西學十誡初解》作序，並曾撰詩贈西士，謂其「言慕中華風，深契吾儒理；著書多格言，結交皆賢士」，其孫益蕃後更入教。[51]又，雲龍的同年顧起元（1565-1628，與李之藻同登萬曆二十六年(1598)進士）嘗形容利瑪竇所帶來的西畫曰：「畫以銅版爲幀，而塗五采於上，其貌如生……臉之凹凸處，正視與生人不殊。」[52]此外，瞿汝說雖雅好西學，但可能因有妾而未曾受洗；其兄汝夔爲天主教徒；汝說之子式耜則或於天啓三年左右受洗，後以納妾而出教。[53]

在姜雲龍等離京赴澳不久，廣東香山籍的禮科給事中盧兆龍，便於崇禎三年五月上疏曰：

> 輦轂之下，非西人雜處之區，未來者當止而勿取，見在者當嚴為防閑。如皇上懷柔異類，念彼遠來，則止可厚其賞賚，發回本澳。[54]

經徐光啓據理疏辯之後，崇禎帝表態仍支持雇募葡兵。[55]至十一月，此事卻急轉直下，因大學士周延儒等題參曰：「誥敕撰文中書舍人姜雲龍，往取澳彝，乘傳驛騷（農按：指出使時引發騷亂）。」奉旨：「當俟復命日查處，章下所司看議。」[56]由於周延儒與奉教的孫元化或徐光啓均應頗有交情，[57]知當時朝

50 朱氏嘗稱：「（利瑪竇）所貢天主及天主母圖既屬不經」，故建議「給賜冠帶還國，勿令潛居兩京」。參見朱國祚，〈請遣還大西洋國人利瑪竇疏〉，收入不著撰人，《聖教書籍記篇》〔輯入鍾鳴旦編，《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台北：方濟出版社據徐家匯藏書樓藏本影印，1996）〕，頁 1853-1854。查索自「全文影像資料庫」。

51 黃一農，《兩頭蛇》，頁 56-57。至於萬曆二十五年應天鄉試的主考官與榜單，可見〔明〕張朝瑞等編，《南國賢書》（台北：國家圖書館藏舊鈔本），無頁碼。

52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小說家類》，冊 243（台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自刻本影印，1995），卷 6，頁 23-25。

53 黃一農，《兩頭蛇》，頁 35-36、312-322。

54 〔清〕汪楫編，《崇禎長編》，卷 34，頁 42-44。

55 *Jesuítas na Asia*, fls. 72-72v.

56 〔清〕汪楫編，《崇禎長編》，卷 40，頁 5。

57 周延儒與孫元化不僅有同年舉江南鄉試之誼，且周延儒的親族周文郁，也與孫元化相熟，此故，在吳橋之變發生後，周延儒曾因欲脫元化死罪，而於崇禎五年(1632)五月援徐光啓入閣兼東閣大學士，希望能共同設法。參見黃一農，〈天主教徒孫元化與明末傳華的西洋火砲〉，《中央

議對姜雲龍的抨擊，令身為首輔的周延儒亦無從迴護。

三年十二月，盧兆龍再度上言抨擊招募澳兵一事，疏中對姜雲龍的指斥尤厲，稱因澳兵遲至八月底仍未起程，致使兩廣總督王尊德以憂國而鬱卒，「通粵民心閧然，思食雲龍之肉」，並指控雲龍貪瀆冒餉，所經手的錢糧，一半為其剋扣。姜雲龍因此被革任回籍，且命詳查議罪。[58]而此一澳門軍隊在抵達南昌後，亦奉命折返。[59]

崇禎四年(1631)三月，頗受打擊的徐光啓疏請休致，其言有云：

> 昨年自請往調澳商，伏蒙聖旨諭留，題差原任中書姜雲龍押送教士陸若漢等迴住〔農按：疑應為「往」字〕。後雲龍被議，職實未知其在廣事情，若果於錢糧染指，職宜膺不適之罰。……今據廣東巡按臣高欽舜報疏，稱督臣差通判祝守禧齎發安家、行月糧等銀，至澳給散，則雲龍身不入澳，銀不經手。續據陸若漢奏稱，通判祝守禧領布政司原封銀兩到澳，唱名給散等因，語亦相符。蓋調兵、造器、給糧等項，皆督、按、道、府諸臣，以地方官行地方事，雲龍不過督役催促，其於俵散錢糧，即欲與聞，亦理勢之所無也。

徐氏對姜雲龍被控剋扣雇傭軍錢糧之事大力辯駁，指其並不曾經手銀兩。諭旨安撫徐光啓曰：「卿清恬端慎，精力正優，詞林允資模範。不止修曆一事，着安心供職，不必引陳；其澳商事情，已有旨了！」[60]但募葡兵之事卻已無可挽回。

姜雲龍被革任回籍後，仍多方參與里中士紳的活動。崇禎四年間，他曾（至少掛名）參加《松江府志》的撰修。[61]十一年(1638)，由陳子龍、徐孚遠、宋

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67 本第 4 分，頁 911-966。

58 〔明〕汪楫，《崇禎長編》，卷 41，頁 13-14。

59 Antonio de Gouvea, *Asia Extrema*, Segunda Parte (Biblioteca da Ajuda, *Jesuítas na Asia*, Cód. 49-V-2), p. 219.

60 此段參見〔明〕徐光啓，《徐光啓集》，頁 304-306。

61 〔明〕方岳貢修，陳繼儒纂，《松江府志》，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據崇禎四年(1631)刊本影印，1991），卷首。

徵璧三人主編的《皇明經世文編》五百餘卷成書，書中共收錄徐光啓的《徐文定公集》六卷，姜雲龍和宋徵輿翁婿兩人各參閱一卷；此外，姜雲龍還另參閱余懋衡的《余太宰奏疏》兩卷。[62]十四年(1641)夏，松江地區大旱，米價貴至三兩一石；知府方岳貢聚眾商議，欲減至二兩，姜雲龍則主張減五錢即可，雖未獲接受，卻引發遊民暴動，將其家產劫毀殆盡。[63]

明末文獻中有關姜雲龍生平事跡的記載，應以〈壽姜神超七袠小敘〉一文最豐富，[64]此文是由李逢申口授其子李雯代筆，根據其中內容，可間接推知姜雲龍的生年或在萬曆三年(1575)（參見附錄）。亦即，姜雲龍是在四十八歲左右放棄久試不第的舉業，佐樞輔孫承宗戎幕，並透過此一渠道於稍後入仕，崇禎朝歷官至誥敕撰文中書舍人。[65]

李逢申在前引壽序中頌讚姜雲龍「倜儻恢奇，交遊滿世」，且對「邊境形勝、國家利害、人才長短」，均「視若明鏡，言如指掌」，並謂：

> 雖然先生當顯皇帝時，固嘗騰英聲、履太平矣，先生不以才名驕，不為富貴餌，燕居獨念曰：「天下將有變，惟是兵農强富之術，無所不用其心焉！」……先生第不登甲科，位不過郎秩，然朝廷有大故，未嘗不參謀議其間。其所出入周旋者，宰相以十數，邊境大帥、蕃落將領以百數，四方奇材、劍客、游俠、輕死之徒以萬數。會當今天子神聖，志在撌清天下，引領而望曰：「姜先生必能爲國家成大功，掃三

62 吳琦、馮玉榮，〈《明經世文編》編纂群體之研究〉，《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卷 41 期 1(2002)，頁 129-134；〔明〕陳子龍等輯，《皇明經世文編》，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22-29（北京：北京出版社據明崇禎雲間平露堂刻本影印，2000），卷 471-472、490、493。

63 由於宋徵輿對方岳貢的評價甚差，嘗稱：「岳貢治郡十二年，殘民以逞，冤死千數。」此與《明史》或一般鄉紳的看法出入頗大。先前學界不解爲何會出現如此兩極情形，筆者疑其或受此家變的影響。參見〔清〕楊開弟修，姚光發等纂，《華亭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蘇省》，號 45（台北：成文出版社據光緒四年(1878)刊本影印，1970），卷 24，頁 25-26；姚蓉，《明末雲間三子研究》，頁 102-103。

64 〔清〕李雯，《蓼齋集》，卷 33，頁 14。查索自「中國基本古籍庫」。

65 方志中有以姜雲龍曾任正四品的太僕少卿，此說如真確，則或是清廷爲籠絡原明代官員所給與的虛銜。參見〔清〕楊開弟修，姚光發等纂，光緒《華亭縣志》，卷 16，頁 19。

> 韓之北，犁單于之庭。」即先生雅亦以此自負，而不意為忌者所中，免官而歸。……然猶太息時艱，嘗思捐軀赴國，得一當以報天子。[66]

稱姜雲龍在明神宗（諡號爲「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時即已有名聲，雖然他只是舉人出身，且「位不過郎秩」，但卻參預許多重大事件，交游滿天下。文中所謂的「蕃落」，乃指外族，疑「蕃落將領」應包含他在崇禎三年自澳門所聘募葡兵中的軍官。

四、小 結

綜前所述，姜雲龍是徐光啓的同鄉且於同年中舉，他之所以能至遼東參贊孫承宗幕，有可能是受到承宗同年好友徐光啓的推薦。姜氏雖然對西人、西學相當友善，但因他非天主教徒，故其所受到徐光啓的「照顧」，相較於孫元化而言，就顯得遜色不少。孫元化比姜雲龍年輕，中舉亦遲五科，但在仕途發展上卻較順利，元化在師生、同年、同鄉、同社和同教等人際網絡（數位資料庫是爬梳這些關係的利器）的間接協助下，加上充分發揮教中人士所專擅之西洋砲學和兵學，終於成爲明代極少數以舉人陞授巡撫者。同樣地，當李之藻等天主教士大夫於泰昌元年(1620)至崇禎元年間幾次推動至澳門購砲時，即是遣派奉教的張燾（李之藻門生）或孫學詩〔萬曆二十二年(1594)雲南舉人〕前往，他們都憑藉此類任務獲得升遷，並分別歷官至副總兵和都司。[67]

姜雲龍直到崇禎三年四月才由徐光啓奏遣至澳門募葡兵並購西砲，時年已約五十六歲。當時張燾在遼東的鹿島擔任贊畫游擊，[68]孫學詩則於是年正月才率領一批澳門來的銃師和大砲抵京效命，[69]在兩人都無法應命的情形下，徐光

66 〔清〕李雯，《蓼齋集》，卷 33，頁 15-16。
67 黃一農，〈天主教徒孫元化與明末傳華的西洋火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67 本第 4 分，頁 926-927。
68 〔清〕汪楫，《崇禎長編》，卷 38，頁 9。
69 黃一農，〈天主教徒孫元化與明末傳華的西洋火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67 本第 4 分，頁 911-966。

啓很可能才因此選擇了姜雲龍，沒想到卻遭致嚴重打擊。但我們從姜氏周遭人物所呈現的態度，已可深刻體會西學在明末社會的穿透力與擴散力。

晚明所引進的西方兵學知識以及圍繞西洋火砲所揭舉的軍事改革，乃以徐光啓、李之藻、孫元化、張燾、孫學詩、韓雲、韓霖、陳于階等天主教徒爲軸心，[70]並藉由對西學較友善之孫承宗、袁崇煥等官員的推動，加上此一新型武器於寧遠大捷(1626)後在各戰場上的優異表現，遂使西砲逐漸於明清戰爭中引領風騷，甚而在明清鼎革戰爭中扮演關鍵角色。明亡之後，年已逾七十的雲龍或只能安老鄉里，眼睜睜看著入關清軍在西洋火砲以及投降漢人砲兵的協助下，攻城掠地，而其交往諸人當中更不乏降清出任高官者。[71]

此文的推理過程及其對數位資料庫的運用，或可看作是 e-考據的典型案例。e-考據與傳統考據並不是對立的兩套方法，e-考據只是傳統考據學在 e-時代的昇級版，兩者最大的區別，就在於前者具有較多的可操作性(operationable)，能在合理時間內進行先前較難施行的分析，並因此較有機會開創出新的研究格局。[72]當網際網路在上世紀末沛然興起後，中央研究院首建

70 當時傳華的西洋火器知識，幾乎完全掌握在耶穌會士或天主教徒手中，且往往視爲秘學。事實上，較重要的中文火砲學新著，幾乎全出自天主教人士，此因耶穌會士是極少數擁有足夠語文能力以傳遞西方火器知識的人，而奉教士人也積極著書立說，突顯西砲的威力，以吸引統治者的注意，並進而提昇西學和西教的地位。參見黃一農，〈紅夷大砲與明清戰爭：以火砲測準技術之演變爲例〉，《清華學報》，卷 26 期 1(1996)，頁 31-70。

71 如王世忠爲居住在開原南關的少數民族後裔，與後金爲世仇，天啓年間曾獲李之藻等人疏薦，先授夷官副總兵，再加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專管撫夷事，崇禎初因貪墨被罷廢，嘗至上海，「主姜神超先生家」，稍後至楚投靠平賊將軍左良玉。順治元年(1644)，王世忠赴北京降清，其婿左夢庚（良玉之子）亦於次年率大軍投降，歷官至固山額真。參見〔明〕溫體仁等撰，《明熹宗實錄》，卷 27，頁 24-25、卷 35，頁 4、卷 67，頁 18；〔清〕葉夢珠輯，《閱世編》，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叢書集成續編・總類》，冊 12（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據《上海掌故叢書》排印本影印，康熙間成書，1989），卷 10，頁 16-17。王、姜兩人交往之事，是用「姜神超」爲關鍵詞查索自 http://www.google.com 。

72 張國剛先生在〈「兩頭蛇」的行藏〉一文中有云：「一農所強調的 e 考據時代區別於傳統考據學在於，現代檢索手段給史學研究提供了非常不一樣的天地，通過電子資料庫和正確的檢索方法，e 時代的歷史工作者可以做到很多傳統時代做不到的事。誠然，e 考據是搜集材料的一個現代手段，但是這個現代手段是以傳統史學的積累爲基礎，以對現代技術的掌握爲前提的，而只有兩種能力兼備，才能夠在 e 時代進行考據，並取得相當的成果。一農強調 e 時代的來臨，是因爲目前大多數的學者還不能意識到電子技術等對史學研究的影響，而這種影響又是極其深遠的緣故吧！」參見《博覽群書》，2006 年第 7 期，頁 34。

「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接著兩岸一些公私立機構開始將大量漢文古典文獻數位化，此一趨勢正方興未艾。故歷史工作者實有必要學習如何掌握正確之搜尋技巧，以便有效運用浩瀚且龐雜的史料。

然而，爬梳史料的過程常不僅僅是平面式的搜尋，必須再透過敏銳的問題意識與細緻的邏輯推理，就相關之人物、地點、時間、官銜或史事等，進行疊代式(iterative)的檢索，從搜尋中獲取新知識或新線索，再從中繼續搜尋，期能深化研究的結果，甚而梳理出有力的間接證據（參見附錄之案例）。[73]又因文獻龐雜，搜尋出的條目有時會因過多而無法處理，此時就需依靠由個人所積累出的文史基本功，來做挑選篩濾的工作，以求較有效率地獲得有用的材料。[74]

雖然本文所參閱的約三十種古籍，很可能是上一世代學者所無法想像、甚至挑戰的，亦即，此一個案研究在早先的環境下將很不容易做到，惟其學術成果仍將取決於治史的能力。[75]且因古籍在數位化時，往往文字出現訛誤，[76]版本的選擇也常未臻理想，[77]故使用時仍須了解這些侷限，儘量再回查原書，並做足甄別史料的功夫。又因材料不太可能全面數位化，傳統的資料蒐集方法，亦不應偏廢。

在熊熊先生的〈e 時代的兩頭蛇〉一文中，誤認筆者主張獨尊 e-考據，且「放棄對非 e 資料的運用」。其實，筆者相當重視非數位史料，《兩頭蛇》中

---

73 黃時鑒先生在〈歷史天空的「兩頭蛇」〉一文中有云：「所謂『e-考據方法』就是『用‘e-’的工具、手段和路徑來做好考據的方法』。這樣去做，比諸原來考據時單純用人腦和手工的閱讀、記憶、分類和排比，在廣度、速度和準確性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而這種條件又必然促進研究者的聯想、推斷、分析和綜合。毫無疑問，這種 e-考據方法必將被學人越來越廣泛地運用，從而大大地推進歷史學以及其他一些人文學科的發展。」參見《九州學林》，卷 4 期 3，頁 304。

74 至於如何在自己的腦海中建置一個解析度愈來愈好以及涵蓋面愈來愈廣的「知識地圖(knowledge map)」，並如何有效運用此一虛擬地圖發揮研究的導航工作，則非此一短文所能論及。

75 讀者或許願意試試掩卷各自去追索姜雲龍其人其事，相信所獲材料的多寡以及分析得出的結果，均將出現很多不同的層次。

76 此只有透過使用者的共同參與，才可能有效改善。但目前各數位資料庫的設置者，均未提供任何機制及誘因，嘗試增進其內容的正確率。以本文所大量使用的「中國基本古籍庫」為例，除因簡體轉繁體導致的錯誤外，在辨識古籍文字時所產生之魯魚亥豕的情形，即俯拾可見。

77 白謙慎，〈網絡時代明清書法史研究的史料問題〉，「2008 中國蘇州（相城）書法史講壇」，蘇州：中國書法家協會，2008 年 7 月 18-21 日。

所引用的逾千種文獻多爲歷年讀書所累積，而非如許多人所以爲的，全是靠網路檢索，且筆者先前許多較重要的研究亦均曾儘量進行田野考察。惟因對史料的全面掌握，往往超乎任何一己之力，除依賴個人的努力之外，還需靠學界群體的訊息互通以及學術資源的透明公開，才較有可能接近此理想目標。

質言之，真正的 e-考據應是在數位資料的輔助下從事考據，而絕非僅僅依靠數位資料庫。又，e-考據並不保證能提供完整的解決方案，[78]更無從讓一位史學的門外漢立即登堂入室，但它卻有可能令一位成熟的歷史工作者在較短時間內就增加數載功力，讓傳統的考據功夫有機會達到「力隨意起」的境界，端看他是否知道如何幫自己打通任、督二脈。而且，隨著數位資料的快速擴充與精進，[79]e-考據的效能正與時俱進。[80]惟最困難的挑戰亦將隨之而起，誠如章可先生所稱：「雖然看起來在這個 e-考據時代裏，學者們的工作量要減少許多，但實際上，在材料逐步完備的情形下，怎樣才能講出……精彩的故事，史家身

---

78 筆者先前在《兩頭蛇》第二章研究瞿汝夔其人其事時，根據文集中所收錄的十幾種瞿氏家人的碑傳資料，推判汝夔乃譚氏所生。然熊熊先生在〈e 時代的兩頭蛇〉一文中指出，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有《五渠瞿氏家譜》，明確記稱汝夔的生母乃支氏，他遂因此批評 e-考據是很「脆弱」的。由於筆者先前所過眼的大量文獻，均只提及汝夔之父景淳的妻妾有李氏、譚氏和殷氏，從不曾出現支氏其人其事，故在有限的條件下，依據邏輯推理所得出之最可能的結論遂與事實不合。然而，此一訛誤並非是 e-考據所獨有，傳統考據過程中亦常會因未能掌握關鍵史料而出現類似情形。至於爲何眾多相關文獻當中，竟然可以完全不見支氏的蛛絲馬跡，則或因書寫者均知瞿家對因叔嫂通問之奸所產生的「家難」十分敏感，故在文字上動了手腳，蓄意抹煞支氏的存在。亦即，e-考據在此一析探過程的不成功，多少有些非戰之罪。再者，熊文又引筆者未見的常熟市圖書館藏《瞿氏家乘》（該館網站查不出此書），稱汝夔之弟汝益的生年應是 1557 年，而非筆者所估的「1555?」。事實上，此例或不應被拿來攻擊 e-考據，因在未能獲見直接文獻證據的情形下，此一估算應算是相當接近。

79 由於商業利基已湧現，故一些公司（如北京的愛如生）開始較大規模投入開發的行列，惟因產品的價格高昂，故肯定將造成明顯的「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事實上，國外學界目前購置漢籍數位資料庫的情形，就遠超過中國各大學。

80 如《兩頭蛇》中曾提及孫錫齡有一詩追贈韓霖，末句爲「肯將蜍志羨餘生」，筆者在初版中誤釋成：「（韓霖）肯否效法蟾蜍在園池中安度餘生？」（頁 251）余英時先生閱後即函告「蜍志」乃用《世說新語・品藻》之典，因晉人庾道季有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懍懍恒如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故「蜍志」實爲曹蜍、李志二人的合稱，借指庸碌之人。查「蜍志」一詞，不僅未收入中國歷來規模最龐大的《漢語大詞典》，亦未見於「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事實上，如非熟讀《世說新語》之人，很難透過一般工具書或數位資料得知其出典。也就是說，傳統文史功力的累積仍有其突出的價值。然而，若讀者現在至 google 檢索「蜍志」，將可發現筆者在個人網頁中對此所作的勘誤。

上的擔子，卻一點也沒有輕下去。」[81]

最後，筆者雖首揭 e-考據時代的到臨，並不代表本人已能順暢地運用此一沛然真氣來「御春秋史筆」。也就是說，拙著中仍有可能陸續發現一些錯漏之處。不過，這些訛誤應多肇因於筆者學力的未逮，而不見得應歸咎於 e-考據。

金代著名學者元好問在其七絕〈論詩三首〉中有「鴛鴦繡了從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句，[82]但筆者仍不計淺陋，野人獻曝，希冀能將 e-考據這隻「金針」介紹給史學工作者。衷心期盼中國史的研究也能充分運用資訊工具，以強化梳理和鑽研史料的能力，方不至愧對科技進展所賦予我們的特殊條件。

戊子中秋前夕完稿於新竹脈望齋

【後記】

2008 年 6 月，曾在上海聽過筆者演講的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生賈雪飛同學，透過電子郵件轉寄王成義先生贈送的康熙《五渠瞿氏家譜》圖檔，雖然僅有一面之緣的王老，或是希望藉以斧正拙著中的訛誤，筆者內心仍滿懷感激，惜在《兩頭蛇》2007 年的繁體字修訂再版中已不及訂正。雖說類此的學術互動不是 e-考據時代所獨有的，但網路的便捷無疑讓其更具有「可操作性」。

81　章可，〈兩頭蛇的前世今生〉，《讀品》，輯 15(2006)，頁 14-16。

82　〔金〕元好問，《遺山先生文集》，收入商務印書館編，《四部叢刊初編・集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烏程蔣氏密韻樓藏明弘治刊本影印，1965），卷 14，頁 8。

附錄：姜雲龍生年小考

李雯代其父逢申所撰之〈壽姜神超七袠小敘〉一文中稱：「余與姜先生遊，蓋三十餘年，余少先生者五歲，而先生已七十矣！」知姜雲龍年長李逢申五歲。逢申，松江華亭人，萬曆三十四年(1606)中舉，四十七年登進士；崇禎三年，任工部主事，因疏劾權貴遭罷；十六年，訟冤復官，李雯於是從行入京；隔年三月，闖軍攻陷京師時死難。[83]知此文的撰寫下限爲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亦即，姜雲龍應生於萬曆三年之前。又因明代官員年七十者「例應致仕」，[84]可推斷李逢申復官時理應不超過此一年齡，間接得知姜雲龍的生年上限在隆慶四年(1570)。

再者，李雯在《蓼齋集》卷三十三依序收錄下列文章：

1. 〈有明同姓諸侯王年表敘〉。撰寫時間不詳。
2. 〈高帝功臣年表敘〉。撰寫時間不詳。
3. 〈文皇功臣年表敘〉。撰寫時間不詳。
4. 〈代陸大司馬送林少司馬還留都敘〉。崇禎十一年撰，代協理戎政兵部尚書陸完學送南京兵部侍郎林宰。
5. 〈公賀方禹修公祖以副院大拜敘〉。賀方岳貢於崇禎十六(1643)年十一月以副都御史兼東閣大學士。[85]
6. 〈公賀范大司空大拜敘〉。賀范景文於崇禎十七年正月以工部尚書

83 〔清〕張廷玉等，《明史》，卷 240，頁 6248、卷 251，頁 6490；〔清〕楊開弟修，姚光發等纂，光緒《華亭縣志》，卷 15，頁 24；〔清〕宋徵輿，《《林屋文稿・詩稿》，文稿，卷 10，頁 1-3。末書所收錄之〈雲間李舒章行狀〉，乃查索自「中國基本古籍庫」。又，雖經多方努力（包含蒐查李逢申中舉人或進士時的同年錄或序齒錄，並仔細研讀其親朋著述中的詩文），但迄今在文獻中尚無法直接或間接查得其生年。

84 當然，我們偶亦可發現例外，但以李逢申的身分地位，應不可能在他已逾七十之後還讓其復官。此一官員退休的年齡限制，乃查索自「中國基本古籍庫」；參見〔明〕孔貞運輯，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冊 56-57《皇明詔制》（北京：北京出版社據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七年(1634)序刊本影印，2000），卷 4，頁 52。

85 〔清〕張廷玉等，《明史》，卷 24，頁 333。此卷所收各文的撰寫時間，均是以 e-考據之法推估所得。

兼東閣大學士。[86]

7. 〈公賀瀛國太夫人壽敘〉。賀崇禎皇帝外祖母徐氏於十七年三月過八十誕辰。[87]
8. 〈壽姜神超七袠小敘〉。代父賀姜雲龍七十壽辰。
9. 〈送周亦大計偕省親敘〉。送大學士周延儒之子亦大於崇禎十五(1642)年閏十一月赴京參加會試並省親。[88]
10. 〈五子同遊敘〉。撰寫時間不詳。
11. 〈陰符經敘〉。撰寫時間不詳。
12. 〈代方郡侯經世編敘〉。代松江知府方岳貢於崇禎十一年序《皇明經世文編》。
13. 〈明文西敘〉。序韓詩撰於崇禎十五年之《明文西》一書。[89]

首三篇屬修史性質之官樣文章，第四至第七篇乃代親長所寫，第九和第十篇是李雯自己的應酬文字，最後三篇則替書籍作序，此四類文章似乎均各依時間先後順序排列。疑〈壽姜神超七袠小敘〉一文應歸入代筆之作，又因《蓼齋集》與《蓼齋後集》所收詩文斷在崇禎亡國之際，故推估該文或撰於崇禎十七年三月。亦即，姜雲龍的生年或是萬曆三年，而李逢申復官約在六十四歲（故還有六年時間可任官，較合情理）。

86 〔清〕張廷玉等，《明史》，卷 24，頁 334。

87 〔清〕李清，《三垣筆記》，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冊 19（北京：北京出版社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鈔本影印，2000），卷 4，頁 14。查索自「中國基本古籍庫」。

88 此或指崇禎十五年中舉的周延儒之子奕封（字亦大？），參見〔清〕阮升基等修，寧楷等纂，《宜興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蘇省》，號 22（台北：成文出版社據清嘉慶二年(1797)刊本影印，1970），卷 7，頁 29。在筆者所能接觸到的各數位資料庫中均查不出周亦大事跡，如若未來能將存世的近萬種地方志數位化〔愛如生的《中國方志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http://www.er07.com/）正開其端〕，對學界的助益將極大。

89 此書初由學古堂刊於崇禎十五年，前有崇禎十六年李楷、崇禎十七年高弘圖等序，但此本未收錄李雯之序。參見〔明〕韓詩，《明文西》（台北：國家圖書館藏崇禎十七年學古堂刊本），前序。查索自台北國家圖書館之「古籍影像檢索系統」(http://rarebook.ncl.edu.tw/rbook/)。

徵引書目

一、資料庫

「中國方志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http://www.er07.com/。

「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http://www.er07.com/。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北京：中國學術期刊（光碟版）電子雜誌社。http://acad.cnki.net/ Kns55/ Navigator.aspx?ID=CJFQ。

「古籍影像檢索系統」。台北：國家圖書館。http://rarebook.ncl.edu.tw/rbook/。

「全文影像資料庫」。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http://lib.ihp.sinica.edu.tw/c/database/ db.htm#graph。

「明人文集聯合目錄及篇目索引資料庫」。台北：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http://ccs.ncl. edu.tw/ topic_02.html。

「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http://140.109.138.249/ihp/hanji.htm。

二、傳統文獻

〔明〕孔貞運輯，《皇明詔制》，卷 4，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冊 56-57。北京：北京出版社據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七年(1634)序刊本影印，2000。

〔明〕方岳貢修，陳繼儒纂，《松江府志》，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據崇禎四年(1631)刊本影印，1991。

〔明〕李長春，《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實錄》，收入《明實錄・附錄》，輯 18。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據該所藏抱經樓舊鈔本影印，1984。

〔明〕岳和聲，《餐微子集》，薊門疏草，卷 1，收入《明季史料集珍》，輯 2。台北：偉文圖書公司據中央圖書館藏明天啓刊本影印，1977。

〔明〕茅元儀，《石民四十集》，卷 1、卷 78，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冊 1386-138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刊本影印，1995。

〔明〕茅元儀，《督師紀略》，卷 12，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冊 36。北京：北京出版社據北京圖書館藏明末刻本影印，2000。

〔明〕孫承宗，《高陽集》，文卷，卷 20，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164。北京：北京出版社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初刻嘉慶補修本影印，2000。

〔明〕徐光啓撰，王重民輯校，《徐光啓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明〕徐光啓纂輯，陳子龍編，《農政全書》，收入〔清〕紀昀等總纂，《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731（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崇禎十二年(1639)初刊，1983。

〔明〕徐肇台，《甲乙記政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雜史類》，冊 438。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1997。
〔明〕徐肇台，《續丙記政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雜史類》，冊 43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1997。
〔明〕高出，《鏡山庵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30-31。北京：北京出版社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刻本影印，2000。
〔明〕張朝瑞等編，《南國賢書》。台北：國家圖書館藏舊鈔本。
〔明〕張鼐，《寶日堂初集》，卷 11，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76-77。北京：北京出版社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二年(1926)刻本影印，2000）。
〔明〕畢自嚴，《石隱園藏稿》，卷 8，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9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崇禎間成書，1983。
〔明〕畢自嚴，《度支奏議》，堂稿，卷 11，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48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1997。
〔明〕郭濬，《虹暎堂詩集》，卷 8，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輯 6，冊 27。北京：北京出版社據清順治刻本影印，1997）。
〔明〕陳子龍等輯，《皇明經世文編》，卷 471-472、490、493，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22-29。北京：北京出版社據明崇禎雲間平露堂刻本影印，2000）。
〔明〕程畜，《寸補》。東京：高橋情報據內閣文庫藏崇禎四年(1631)序刊本影印，1991。
〔明〕溫體仁等撰，《明熹宗實錄》，收入黃彰健校勘，《明實錄》，冊 14。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據該所民國五十一年刊本縮編，1984。
〔明〕劉榮嗣，《簡齋先生集》，文選，卷 3，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46。北京：北京出版社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元年(1661)劉佑刻本影印，2000。
〔明〕談遷著，張宗祥標點，《國榷》。北京：古籍出版社，1958，初刊於順治十年(1653)。
〔明〕錢希言，《松樞十九山》。東京：高橋情報據日本內閣文庫藏明萬曆二十八年(1600)序刊本影印，1991。
〔明〕韓詩，《明文西》。台北：國家圖書館藏崇禎十七年(1644)學古堂刊本。
〔明〕顧秉謙等，《三朝要典》，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冊 56。北京：北京出版社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六年(1626)禮部刻本影印，2000。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 6，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小說家類》，冊 243。台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自刻本影印，1995。
〔金〕元好問，《遺山先生文集》，卷 14，收入商務印書館編，《四部叢刊初編・集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烏程蔣氏密韻樓藏明弘治刊本影印，1965。
〔唐〕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點校本。
〔清〕宋如林等修，孫星衍等纂，《松江府志》，卷 77，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蘇省》，號 462。台北：成文出版社據嘉慶二十二年(1817)松江府學明倫堂藏版刊本影印，1970。

〔清〕宋徵輿，《林屋文稿・詩稿》，文稿，卷 15，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冊 215。台南：莊嚴出版公司據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九籥樓刻本，詩稿配鈔本影印，1997。

〔清〕李清，《三垣筆記》，卷 4，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冊 19。北京：北京出版社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鈔本影印，2000。

〔清〕李雯，《蓼齋集》，卷 26，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111。北京：北京出版社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順治十四年(1657)石維崑刻本影印，2000。

〔清〕阮升基等修，寧楷等纂，《宜興縣志》，卷 7，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蘇省》，號 22。台北：成文出版社據清嘉慶二年(1797)刊本影印，1970。

〔清〕俞樾纂，應寶時修，《上海縣志》，卷 15，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蘇省》，號 169。台北：成文出版社據同治十一年(1872)刊本影印，1975。

〔清〕海濱野史，《建州私志》。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清入關前史料選輯（一）》標點本，1985。

〔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點校本。

〔清〕陳鋐編，《鹿忠節公年譜》，卷上，收入《百部叢書集成》，冊 94，《畿輔叢書》第 17 函。台北：藝文印書館據清王灝輯光緒定州王氏謙德堂刊本影印，1966。

〔清〕彭孫貽撰，刁書仁等標點，《山中聞見錄》。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先清史料》標點本，1990。

〔清〕馮鼎高等修，王顯曾等纂，《華亭縣志》，卷 14，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蘇省》，號 462。台北：成文出版社據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儀松堂刊本影印，1983。

〔清〕楊開弟修，姚光發等纂，《華亭縣志》，卷 24，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蘇省》，號 45。台北：成文出版社據光緒四年(1878)刊本影印，1970。

〔清〕葉夢珠輯，《閱世編》，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叢書集成續編・總類》，冊 12。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據《上海掌故叢書》排印本，康熙間成書，1989。

〔清〕聞在上修，許自俊等纂，《嘉定縣續志》，卷 3，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上海府縣志輯》，冊 7。上海：上海書店據康熙二十三年(1684)刊本影印，1991。

〔清〕瞿施溥，《五渠瞿氏家譜》。清鈔本，康熙十年(1672)左右成書。

不著撰人，《明神宗實錄》，卷 252，收入《明實錄》，冊 11-13。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據該所民國五十一年刊本縮編，1984。

不著撰人，《倒戈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雜史類》，冊 55。台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據北京圖書館藏清初鈔本影印，1996。

不著撰人，《聖教書籍記篇》，收入鍾鳴旦編，《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台北：方濟出版社據徐家匯藏書樓藏本影印，1996。

de Gouvea, Antonio. *Asia Extrema,* Segunda Parte. In *Jesuítas na Asia,* Lisboa: Biblioteca da Ajuda, Cód. 49-V-2.

Jesuítas na Asia. Lisboa: Biblioteca da Ajuda, Cód. 49-V-9.

三、專書

姚　蓉，《明末雲間三子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康志傑，《上主的葡萄園：鄂西北磨盤山天主教社區研究(1636-2005)》。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6。

梁家勉，《徐光啓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湯開建，《委黎多《報效始末疏》箋正》。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

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 年初版及 2007 年修訂再版。

萬　明，《中葡早期關係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四、論文

方　豪，〈明清間西洋機械工程學物理與火器入華考略〉，收入《方豪六十自定稿》。台北：自印本，1969。

古偉瀛，〈書評：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臺大歷史學報》，期 37，2006 年 6 月，頁 351-356。

白謙慎，〈網絡時代明清書法史研究的史料問題〉，「2008 中國蘇州（相城）書法史講壇」。蘇州：中國書法家協會，2008 年 7 月 18-21 日

吳琦、馮玉榮，〈《明經世文編》編纂群體之研究〉，《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卷 41 期 1，2002，頁 129-134。

李天綱，〈e 時代的考據之魅〉，《書城》，2007 年第 4 期，頁 45-49。

李天綱，〈早期天主教與明清多元社會文化〉，《史林》，1999 年第 4 期，頁 43-60。

夏伯嘉，〈書評：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九州學林》，卷 4 期 2，2006，頁 336-347。

祝平一，〈讀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新史學》，卷 17 期 2，2006 年 6 月，頁 251-255。

張小青，〈明清之際西洋火炮的輸入及其影響〉，收入《清史研究集第四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張國剛，〈「兩頭蛇」的行藏〉，《博覽群書》，2006 年第 7 期，頁 31-35。

陳　垣，〈明末殉國者陳于階傳〉，《輔仁學誌》，卷 10 期 1-2，1941，頁 45-49。

章　可，〈兩頭蛇的前世今生〉，《讀品》，輯 15，2006，頁 14-16。

章開沅，〈中國史學的發展趨勢〉，2006 年 4 月 26 日在四川大學之講稿，參見 http://www.blogcn.com/u/91/24/zhujingjin/blog/36833901.html。

黃一農，〈天主教徒孫元化與明末傳華的西洋火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67 本第 4 分，1996 年 12 月，頁 911-966。

黃一農，〈紅夷大砲與明清戰爭：以火砲測準技術之演變爲例〉，《清華學報》，卷 26 期 1，1996，

頁 31-70。
黃時鑒，〈歷史天空的「兩頭蛇」〉，《九州學林》，卷 4 期 3，2006，頁 302-309。
楊艷秋，〈《明光宗實錄》、《三朝要典》的編修〉，《史學史研究》，1998 年第 4 期，頁 48-52。
董少新、黃一農，〈崇禎年間援華葡兵新考〉，審稿中。
熊　熊，〈e 時代的兩頭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59，2008 年 3 月，頁 157-162。
顏廣文，〈明代中書舍人制度考略〉，《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 年第 6 期，頁 107-113。
顏廣文，〈袁崇煥死因試析〉，《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4 年第 4 期，頁 81-84。

A Brief Study of Jiang Yunlong's Macao Commission:

With a Response to Mr. Xiong Xiong's Critique of "e-Evidential Research"

Huang Yi-long*

Abstract

In 1630, Jiang Yunlong (c.1575-?) was sent to Macao to buy European cannon and hire Portuguese mercenaries by the famous late Ming Christian convert Xu Guangqi (1562-1633). Unfortunately, Jiang was accused of corruption and was suspended from his post and prosecuted.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well-trained mercenary gunners that Jiang recruited were also sent back to Macao. Due to this incident, efforts to introduce European cannon in the wake of the defeat of the battle of Saerhu (1619) came to an unhappy end.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Jiang Yunlong's life and his social background to understand why Xu Guangqi chose to consign this important mission to Jiang, and to reexamine the issues surrounding how Western learning penetrated and spread in late Ming society. The results are finally treated as an example how historians can benefit from utilizing newly available massive electronic databases in the so-called "e-evidential research era."

Keywords: Ming history, military history, Jiang Yunlong, Xu Guangqi, e-evidential research

*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